

苏全有 阎宏斌 主编

思想转型问题研究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新登字 6 号

责任编辑:戴其芳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转型问题研究

苏全有 阎宏斌 主编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1 号)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新乡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32 印张:10.5 插页:7 字数:265 千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81015—693—4/D. 96

定价:26.90 元

绪 论

一、改良进程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清王朝统治的岌岌可危,一些官僚士大夫、知识分子从“乾嘉盛世”的迷梦中醒了过来,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避免覆灭的命运,他们致力于改革,意图以改弦更张来求得新的出路,这些人即是中国近代的改革派,他们依次为经世致用派、洋务派、维新派、立宪派。这些派别虽然因所处时期的不同而各有自己的主张、特色,但其承继关系十分明显。

洋务派是继经世致用派而兴起的,二者都承袭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经世思想。顾炎武等主张改革时政,讲求富国强兵,反对清王朝所倡导的理学、考据,认为这是空谈误国,逃避现实。基于这种思想,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派及洋务派,分别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顾炎武等人的主张,核心是关心、改革时政,魏源等人则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要求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而洋务派“师夷”的内容不仅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包括民用、外交等。这三个群体的主张,内涵明显在不断外延。

当然,魏源也曾提出,对西方一切“有益民用”的机器等生产工具,“皆可于此造之”^①。但这一主张十分朦胧,而洋务派不仅明确提出,且将魏源书于纸面上的东西付诸实施,内涵也更加广泛。

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经世致用派的主张核心为“师长说”,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师长说”为“中体西用”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2,《筹海篇》。

的思想雏型。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分子为什么主张师夷长技呢？就是因为封建统治的危在旦夕，他们为了挽救、维护封建统治这个“体”，提出向西方学习，并认为这是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

有论者认为，经世致用派主张“师夷”是为了“制夷”，而洋务派“师夷”却是为了“和夷”^①，其实不然。经世致用派“师夷”一方面固然为了“制夷”，但同时也包含有“制民”的成份。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地主阶级利益代表者的魏源等人，处于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严重摧残、中国社会正在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时期，他们没有背离本阶级的社会背景，只是由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对于封建统治秩序这个“体”威胁最大的是外国侵略者，故而“制夷”倾向掩盖了“制民”倾向。而到了五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阶级矛盾取代民族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魏源作为高邮州知州，大办地主团练武装，与太平军对抗，林则徐也死在镇压太平军的路上。昨日还被他们抨击为腐儒鄙夫的封建官僚和视天下为私产的清朝皇帝，今天在农民革命的风暴面前，又成了阶级利害与共的一伙；昨日还被赞颂不置的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义民”，现在由于侵犯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又成了“粤匪”。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既可以利用人民以“御夷”，又可以“师夷”以“制民”。1852年，魏源在已增补的《海国图志》百卷本中，主张招“乱民”入伍，“精训练而严制之”，他认为这样可以使“国家增无数之精兵，而且沿海消无数之械斗，中原收无数之枭匪。”^②“制民”、“除害”又成了魏源“师长”的主要目的。洋务派处于五六十年代阶级矛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力主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镇压农民起义，而到了七十年代民族矛盾占据主导地位时，洋务派又大办海军、民用企业，以抵御外侮，富国强兵。左宗棠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① 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② 《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

人物，他受经世致用派的影响较大，既镇压过陕甘回民起义，又出兵新疆，抗击沙俄入侵，可谓既“制民”，又“制夷”。综观经世致用派与洋务派的对内对外政策及主张，可知其如出一辙，承继关系十分明显。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而戊戌变法则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分子领导发动的，这两次运动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能否将二者完全割裂或对立起来呢？

改良派的前身为早期维新思想家，其代表人物为容闳、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人，这些人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多出入于其幕府之中，致力于洋务活动，实际上成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参与者，并予以理论宣传上的积极支持，其早期维新思想也并未脱出洋务思想的范畴。

当然，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洋务运动也发表了一些批评的言论，但在初期，这种言论多属于条陈、善意的建议，其目的还不外是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其后，早期维新思想家大力宣传西学、西法，而不仅仅是“西技”，这种主张表面上是超过了洋务运动的范围，但是，如若没有洋务运动的发展基础，他们又怎能更上一层楼呢？

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要通过富国强兵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这个“体”，但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搞洋务，不仅未能达到目的，其结果恰恰背离了初始的愿望。

七十年代，洋务派大力发展民用性工业，正是在这种活动的影响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诞生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导致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并终于在八九十年代登上政治舞台，依靠自己非常弱小、但已有一定实力的经济基础，提出了本阶级的政治上的要求。所以，正是洋务运动提供了戊戌维新运动的经济基础，培植了地主阶级的掘墓人——资产阶级。

维新运动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一事实

说明：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洋务派对自己所发动的这场运动难以把握、控制。他们要维护封建的“体”，但在引进西方的“用”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封建的“体”。“同文馆之争”是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一次重大冲突，但这场斗争却触动了封建教育的“体”；修铁路、开矿山也是两派争斗的焦点，但这也毫无疑问地触动了封建祖坟风水的“体”。而这一结果正是维新派所孜孜追求的。

事物的发展还不仅仅如此，洋务运动的发展使洋务派卷入进去后，其自身也在发生某种“质”的意义上的变化。维新派组织了强学会，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大员参与其间，李鸿章也有此意向。上海《时务报》是维新派最大的宣传喉舌，但它的发展，张之洞起了相当的作用与影响。李鸿章经营洋务长达数十年之久，但在甲午战败这一重大打击之下，其思想发生了巨变，他说：“我办了一辈子西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① 戊戌政变后，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议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② 洋务派发动的洋务运动，改造了中国社会，也改造了自身。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中大都认为其具有启蒙意义，而对洋务运动却颇多苛责，其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大力发展中国的军事、民用工业，其亦应被认为具有启蒙意义。何干之著《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就将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并列入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之中。中肯地说，戊戌维新运动侧重于政治思想方面的启蒙，而洋务运动则为物质方面的启蒙。

从上可见，洋务运动与戊戌之间确有承继关系。

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这两大运动，很长时间以来，史学界所予以的地位相差悬殊，前者受到基本肯定，属进步潮流；后者遭到完全否定，被认为是反动的、欺骗性的。这样一边倒的评价显然是不

① 《庚子西狩丛谈》卷4。

② 孙宝瑄：《日知录日记》。

公允的，我们若将它们放在一起对比考察就会发现，二者之间有一些十分微妙的相同之处，且存在着更替关系。

大凡改革都是从政治方面首先着手，历史上无数次改革可兹说明。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这两次运动，都十分重视政治上的更变。戊戌变法中，裁汰了一批官僚机构，剔除了相当一部分冗官闲衙，并厉行保甲。清末新政中的1906年，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官制改革，虽有“五不议”的前提条件，但成立了十一部。此外，还废除苛刑，改变了旗人的供养制度。

经济方面，戊戌维新运动中，设立了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山总局，倡导西学，奖励发明创造，致力于发展商业，并提出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清末新政中，设立了商部、商会、商务局、农工商总局、邮传部，倡导兴修水利，并制订了一系列章程，对金融事业也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

军事改革也是两次运动极力强调的。戊戌维新运动中规定：裁减绿营，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致力于冷兵器向热兵器的过渡。清末新政中，大办武备学堂，裁旧练新，并编练了16万新式近代化军队。

文化教育方面，戊戌变法中提出改革科举，设立京师大学堂，要求各省派员出国留学。而清末新政中则废除了科举制度，并在全中国大办学校，使新式学堂日趋规范化，派遣留学生的政策导致了20世纪初中国出国留学热的出现。

从以上对两次运动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不仅颇多相似之处，使人们产生清末新政即为戊戌变法的继续与翻版的印象，而且清末新政的举措比之戊戌变法，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清末新政是扩大了戊戌维新运动，它将戊戌维新运动中提出的纸面上的东西，化为了现实。戊戌变法是慈禧太后镇压的，但仅仅两年之后，她又在戊戌维新志士的血泊中高举起自己“敌人”的旗帜，将业已镇压下去的维新运动，在“新政”的幌子下予以重演，并且比

她的“敌人”走的更远。西太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形势的变化使之认识到,只有改革,才能生存,方有出路。

当然,就动机而论,应该说维新派与西太后有相当的差异。维新派致力于变法事业,其目的是为了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完成历史赋予的两大任务,而西太后之所以举办新政,主要是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巩固皇权。但是,“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① 历史不是由动机组成的,而是由人类自身活动组成的。阶级本性决定了西太后并不打算发展资本主义,但她的活动使清末新政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较前也强大了许多。历史给西太后开了一个玩笑,即她所发动的清末新政加速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王朝的灭亡^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经世致用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彼此之间存在着更替关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在不断的相互转化中发展,发扬光大^③;就像一圈比一圈大的浪圈一样,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新陈代谢^④。这四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的改良运动。

辛亥革命在其初始阶段就某种意义上讲是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同步进行的,但其全国性活动则起始于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其一登上政治舞台后即采用武装斗争、城市起义的方式,进行推翻满清的斗争,一改往昔历次改良运动的和平手法,以完成中国的近现代。他们反对康有为的渐进主张,致力于破坏清末宪政运动,发表反满言论,从而中断了中国近代改良运动的进程。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关于改良与革命的问题上,立场鲜明,即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9页。

② 张连起:《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2期。

③ 夏东元:《论洋务派》,《新建设》1964年第5、6期。

④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斥改良，盛赞革命。其实，这是极其不公平的^①。列宁说：“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同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②从中可知，列宁并不反对改良，而是反对以改良为惟一宗旨。事实上，改良与革命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推动中国的近代化。如果改良这一方式有利于目的实现，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之予以较高的评价，反之亦然。中国近代的历次改良运动，使中国稳步地近代化，而至辛亥革命爆发后，旧的社会积累扫荡殆尽，消耗了社会仅有的剩余财富，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③。

二、从自是之心到崇洋心理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心态有一个从自是之心到崇洋心理的转型。究其原因，知识界宣扬的“中不如西”起了关键作用。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一转变应予以充分肯定。

毋庸讳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直到19世纪初中国人仍然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中心，周围皆是部落小邦，雄踞于中国舞台之巅的天子是光被四表的。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和现实中华夏文明发展的水平，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使节的来华，一概视作“朝贡”。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外国，从而体现“天朝至尊”的观念。在人们看来，外国人不论来自何方，都是夷狄，“夷狄非有诗书之教，礼仪之习，好则人，怒则兽，其习气素然。”^④

到了前近代末期的乾嘉道年间，那种蔑视外人的自是之心所

① 苏全有：《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忧思录》，《中州学刊》1995年第5期。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8—159页。

③ 苏全有：《对辛亥革命影响的冷思考》，《学术论坛》1997年第2期。

④ 明宣宗：《驭夷篇》，载《明宣宗宣德实录》卷三八。

折射出来的更多是愚昧无知、孤陋寡闻。乾隆时名士杨复吉，就曾把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当作南北美洲；道光皇帝也不知道英国在什么地方，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对于中西通商，清政府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而“番人性嗜乳酪，胶结肠腹，惟大黄茶叶，荡涤精神，”如若数月不食，就“有瞽目肠塞之患”。

关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即夷夏之辨，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也指出：“我国轻视外人之心理，古代已然：曰蛮，曰狄，盖谓其人之等诸禽兽也；曰夷，曰戎，盖谓其人之粗野无文，而日操弓戈以相向。此种自尊自大之观念，虽由于本性与习惯使然，然向所与中国接触之民族，绝少文化足与汉种相抗衡者；且以兵力所及之结果，四方万国，咸来朝贡，致令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以为天朝大邦，除禹区神州外，皆部落蛮貊之首长。自海通以还，欧洲民族，渐次东来，我国亦误用其惯法以对付之，呼荷兰英吉利曰‘红毛蕃’，葡萄牙曰‘澳夷’，又以通使为朝贡，订约为乞恩，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①。约瑟夫·塞比斯的评论更具有针对性，他说：“中国抗拒和外国发生接触，所采取的方式是傲慢自大和令人屈辱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是优越的，或者不如说任何其他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磕头和他们所期望的礼物或贡物连在一起，就被中国人认为是中国宗主地位的证明。”^②

最能反映知识分子自是之心的，一方面固然是夷夏观念、朝贡制度，另一方面则是文化上的西学中源说。也可以说，西学中源说是夷夏观念在文化上的折射。

自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后，一些认同西学的士人便把西学说成是从中国古代时期流传到西方的学术，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787页。

^② 约瑟夫·塞比斯：《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12页。

是中国学术的变种，以迎合“天子失官，学在四野”、“礼失而求诸野”的传统文化观念。正如阮元在《畴人传》中所道：“自利玛窦入中国，西人接踵而至，其于天学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礼失求野之义也。”甚至到了鸦片战后，邹伯奇、林昌彝、梁廷楠等人也仍用西学中源说解释西方文化。如邹伯奇在《论西法皆古所有》一文中认为，“西人天学未必本之和仲，然尽其伎俩，犹不出墨子范围”；“至若泰西之奉上帝，佛氏之明因果，则尊天明鬼之旨，同源异流耳，墨子经上云：此书旁行缶无非。西国书皆旁行亦祖其遗法，故谓西学源出墨子可也。”^①洋务运动时期，几乎所有的士大夫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陈炽、郭嵩焘、曾纪泽等，都不同程度地倡言西学中源，成为其代言人。随着西学传播的深入，到了戊戌时期，严复等人终于否定了西学中源说。

客观而论，西学中源说在传统文化的包围中对于认同西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给外来文化在华登陆，找到了一块立足之地，提供了一片回旋余地。但就实质而论，西学中源说是传统的华夷等级秩序那种自我文化中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反映，表现出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及中国中心观的根深蒂固。

总体看来，我国传统文化随着自身的发展越发的封闭，而非开放，趋于保守僵化，而非充满活力。我们从传统文化中最保守、稳定的因素——文化心理状态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宗教情绪、审美趣味、民族性格等内容中，即可洞悉一切。自是之心作为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状态的表现形式，它规范了传统文化的类型和主导潮流，并进而形成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没有世界文化作为背景和参照系，自成独立王国。

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

^① 《邹征君遗书》，《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辑第2分册，台北1972年版，第1135—1136页。

人们多起来了，加之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①这一人木三分、富有理性穿透力的观点，很有助于我们理解、对待以自是之心为表征的传统文化心理。

鸦片战争作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其隆隆炮声震落了赫赫天朝的尊严和威风，惊扰了农业帝国的酣梦和平静，同时也淹没了士大夫颂诗读经的浅斟低唱。中国文化雄视万方、目空一切的目光，开始出现了惊奇、惶惑、疑虑和反省。

综观近现代的历史，在对待西洋文明的态度上大致可分为崇洋、喜洋、媚洋、惧洋、仇洋、忌洋等类型。

崇洋、喜洋是一种类型，其表现可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器物层。

鸦片战后，洋货运入中国数量激增，英国人福春说：“行近上海之时，首先触及眼帘之事物，为林立之桅樯。惟是项桅樯，非仅属于前次所瞩目之帆船，并且属于大都来自英美两国之船只，其时停泊沪埠之大号外国船舶，共计二十六艘，其中多数，运载外国制造区之出品而来……。”^②随着洋货滥入，相应的商业销售网络应运而生。1843年澳海关告示指出：广州“近岁以来，开设洋货店户者，纷纷不绝”^③。“在大街上可以看到许多商店出售外国食品”，以及肥皂、煤油、火柴等日常用品^④。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诸如衣、食、住、行及器用等方面，洋货几乎是无时不在，无孔不入。衣上有西服、和服及西式军警服装等；食上有西餐，西式食品有汽水、冰激凌、啤酒、罐头、点心、香槟酒、

① 《鲁迅选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② 《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转引自潘君详、陈立仪：《十九世纪后半期上海商业的演变》，《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55页。

③ 伦敦英博物院所藏鸦片战争史料广东探报，转引自黄逸平：《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商业的产生》，《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166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096—1097页。

葡萄酒、威士忌、巧克力、纸烟等；住上有不同于传统风格的西式建筑，其建筑结构也由木构架而向砖石结构、砖石钢骨混凝土混合结构过渡；行上为有轨电车、汽车、铁路、火车、轮船、电线电报、无线电通讯等；器用包括室内、生活、文化、消闲、计量等方面，有洋炉子、钢琴、沙发、浴盆、电扇、煤气灯、火柴、电灯、钟表、缝纫机、铅笔、钢笔、墨水、西式纸张、机械印刷术等。真可谓是不胜枚举^①。

其次为习俗、信仰、观念及制度方面。

习俗方面包括娱乐、婚丧、社交时令等。娱乐上有话剧、电影、西式舞蹈、体育比赛、打扑克、照相等；婚丧上为西礼结婚、新式丧礼；社交时令上有跪拜向鞠躬过渡、阳历纪年等。信仰方面指从传统宗教信仰者中衍生出一批基督教信仰者，他们可分为四类：信教、依教、吃教、投教^②。观念方面，在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传统自然观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如认同哥白尼日心说、批斥五行说等。制度方面，包括政治、军事警察、司法、教育、经济等内容。政治制度上主要有总理衙门、责任内阁制，并改变了传统的六部制；军事警察制度上为对军队的装备、编制、管理、训练实行全方位西化，并建立了新的警察制度；司法制度上依三权分立原则，建立近代法制体系；教育制度上则加强了女子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等，并允许外国人办学，办报刊；经济制度上为发展近代新式工业、农业、商业，分散的市场在向统一的全国市场过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向一体化的商品经济过渡，等等。

第三是文化交流方面。

在近代中国，通过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西方社会也确实增进了对华的了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它在中国大规模地输入、渗透，猛烈地撞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从而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和

^① 参见史革新：《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章。

^②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巨大的影响。此时，根植于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并已进入发展烂熟阶段的中国传统文化，所面对的决不再是过去那些粗蛮古朴、很快就被中华文明所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高度发达、必将对我们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总体看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失衡的，主体是西学东渐。崇洋、喜洋现象在这股大潮的浸润之下，应运而生。

媚洋是第二种类型。相对而言，媚外是一个较少的现象，它主要产生在外国人所办的学校、教会等机构以及与外人交往频繁的买办阶层中。

为了配合对华侵略政策，列强在文化领域致力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等。从1860—1890年，耶稣教教会在华发行期刊70多种，截止1889年设立医院60多处，到1900年在华的耶稣教系统的教会共计600多个。天主教系统的势力更大，到19世纪末，仅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省就有会所2400多个，教堂1500多所，教民15万人；此外，还有中等学校30多所，初等学校500多所，学生万人以上；大小修院10多所，院生350人左右；医院、施药局及育婴堂等数十。在这些机构中，教会宣扬西洋文化优越论，向中国人灌输奴化思想，播撒媚外思想。英国教士朴笛南姆威尔在《庚子使馆被围记》中称，北京一些旗人，为从龙嫡嗣，但和外国人甚为“亲昵”，因为他们入了教，“爱其教主，乃过于爱其朝廷也”^①。

买办阶层并非近代的产物，但在鸦片战后作为一项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带有殖民地性质。一般来说，买办为外国洋行提供的服务项目主要有：打探经济情报、招揽业务等，其收入来源主要靠收取佣金，且相当可观。据估算，从1840—1894年间，买办资本累计约4.5亿关两。有学者指出：“1890—1913年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值约自两亿一千多万关两增至九亿七千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第211页。

多万关两；而同时期内，中国一切通商口岸的全国外籍商行数最高还不足四千家，各种外籍人员总数不过十六万多人。这么几家外籍商行完全不可能和中国人民进行直接交易到如此庞大的数字。所以洋货在既到通商口岸之后，土货在未到通商口岸之前，自两亿一千多万至九亿七千多万的贸易额，全部必须通过买办之手。”^① 买办阶层靠着与外国人做生意而发家致富，他们的媚外思想相对较为突出。《点石斋画报》上就提及，在 19 世纪后半叶穿西服的多为买办。

第三种类型为惧洋、仇洋、忌洋等。

近代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之所以仇洋、惧洋、忌洋，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列强对华的大肆侵略。随着鸦片走私有增无减，烟毒危害愈演愈烈。林则徐有一名言颇能说明问题：“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② 鸦片之外，则为洋货输入，致使工商业者破产失业。郑观应谈及这一情况时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③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义和团运动是第三种类型的最好说明。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如“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兵法易，助学拳，要拚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总而言之，凡关

①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41 页。

② 《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端片》，《林文忠公政书》，中国书店 1991 年版，第 104 页。

③ 《盛世危言·纺织》，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15 页。

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①。为表示同“洋”决绝，义和团掀起改名风，如洋药改为土药，洋货改称广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称鬼钞，洋炮改称鬼銃，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东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改洋字为“洋火”，“其意盖为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才清”，“其意盖谓扶清也”^②。义和团仇洋、忌洋，单就形式而论是笼统排外，是历史的反动，但究其原因，则是列强侵略的产物。李大钊指出：“义和团虽发于仇教的心理，而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文化上的冲突。”^③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仇洋、忌洋实质上是惧洋的极端表现。

从自是之心到崇洋心理这一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型，列强侵略无疑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外因的推波助澜，就其内因而论，知识界从魏源开始数十年不间断地宣传中不如西，并导致中西文化地位的反向互换，才是关键中之关键。

总体看来，与媚洋、仇洋等类型相比，崇洋这种形式无疑居于主导地位，就如同自是之心在前近代的地位一样。那么，如何评价崇洋心理呢？

这里，首先需要概念上的界定，那就是“崇洋”一词的内涵。以往我们总是将崇洋与媚外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崇洋包含有媚洋的内容，这是不恰当的。严格意义上讲，崇洋就是推崇西洋文明，进而效仿、学习。魏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先哲，他的师长说拉开了从自是之心到崇洋心理的转型序幕，并于20世纪初基本成型。自是之心乃传统心理，崇洋心理才是现代心理。“现代性”是泛指心理、态度、动机、行为倾向于接受新事物和新价值的某种状态，而在传统社会里，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因袭的、单纯

① 转引自路遥编：《义和团运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72页。

② 柴萼：《庚辛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108页。

③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受环境的影响绝少变化，由孩提时期至成年时期几乎不必也没有机会予以调整，因此，要求一个传统社会的成员接受新价值、新事物极其不易。所以，我们应对崇洋心理予以相应的肯定。

这里有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传统社会能轻易放弃其传统文化，无保留地接受新事物和新价值。所以，在对新情况的适应过程中，或在从事现代化改革的努力中，一定会产生新旧的矛盾、对抗和政治秩序某种程序的脱节。这是一条痛苦而漫长的旅路，因为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对新事物的对抗力量无比巨大。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努力，必需一方面排除反现代因素，一方面接受新价值和新制度乃至新知识。在相当复杂的破坏——重建——整合工程中，破坏——重建作为调适阶段将非常混乱、痛苦、艰难，最后才能缓慢步入整合阶段。

从自是之心到崇洋心理，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需解决的问题。一般说来，只有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三个范畴中的反现代因素被抑制的情况下，现代化的努力才有成功的机会。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培养现代化的认知态度，根植新的价值观念。现代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的指导原则，更是一种共同接受的价值标准。只有在社会成员普遍培养现代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前提下，现代化的推动才能贯彻。崇洋心理作为一种现代心理，它是我国现代化的基石，是改革、开放的心理前提。

无疑，崇洋心理取代自是之心，是适应现代化要求而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但是考虑到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化所起的作用、影响主要是负面的问题，那么，这扬弃较多的就是弃，就是否定。悠久、发达、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到了前近代末期为何沦落到如此之境地？原因是在社会演化的每一个阶段，首先直接作用于现实的，乃是最切近的前一阶段的条件基础和运动惯性。当时传统文化就如同一个烂熟的桃子，使得我们难以承认自己的落后，需要借鉴异质文化